



中国经济科学前沿丛书

中国商业理论前沿

郭冬乐 宋 刚 /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商业理论前沿

郭冬乐 宋则 主编

博 库

中国·美国·台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商业理论前沿》主编、作者

主编：郭冬乐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宋 则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商业室主任、研究员

作者：第一章 洪 涛 北京工商大学副教授、博士

第二章 陈文玲 国务院研究室研究员、博士

第三章 纪宝成 教育部计划司司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亚平 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

第四章 万典武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研究员

第五章 荆林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博士

第六章 于淑华 国家国内贸易局商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第七章 沈小静 北京物资学院副教授、博士

第八章 叶杰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第九章 黄国雄 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蔡文浩 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

第十章 李金轩 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第十一章 袁永康 国家国内贸易局博士

第十二章 余厚康 国家国内贸易局商业研究中心研究员

第十三章 唐伦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研究
员

第十四章 贺名仑 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教授

第十五章 张群群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博士

总序

为了归纳、总结一定历史阶段内中国在财政、金融、对外经济贸易、商业经济等方面的理论发展与研究概况，系统地反映中国上述领域和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与学术进展，为以后的深入研究提供背景资料和重要的学术参考，为中国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与发展奠定基础，同时也为国外学者了解中国经济理论提供一个方便的“窗口”，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组织编撰了具有重要理论、学术乃至决策参考价值的4部专著，即《中国财政理论前沿》、《中国金融理论前沿》、《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和《中国商业理论前沿》。

我们力求使这4部专著具有以下特点：其一是理论性或学术性，即重点反映上述4个领域或学科，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理论研究概况和重要的学术观点。其二是历史性，即反映一定时期内的理论发展脉络或发展轨迹。对不同的问题而言，尽管研究的起点、理论积淀的厚度会有所区别，但注意到它们的动态演进过程，无疑是十分必要的，有助于保持学术研究上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其三是前瞻性，即在对一定历史阶段的相关理论进行概括、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作者对今后进一步深化研究的看法与展望。其四是理论与实践、学术研究与对策研究的结合性。从总体上讲，4部专著所涉及的学科，都属于应用经济研究的范畴，在改革开放和建立、完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事实上它们也早已走出了“经院式”研究、为理论而理论的时代。因此,反映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学术研究与对策研究的相互促进,以及这种结合中所存在的理论问题及实践课题,既是一种客观的需要,也是本书的一个明显特点。

当然,由于种种原因,书中的文稿,并非每一篇都能体现上述的所有特点,但却是我们对绝大多数篇目的希望和要求。

此外,还有几点须在此逐一说明:

一、鉴于财政、金融、对外经贸、商业经济理论等涉及的范围较广,每一个方面或领域都是一个包容万象的复杂理论体系,因此只能从中选取某些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特别是在近些年来有明显理论进展和理论突破的方面或问题,加以重点的反映和研讨,既不可能普遍涉猎、面面俱到,更不能成为一个理论体系。

二、写作上,以中国相关经济理论的发展为基础、为主线,以国外有关的学术动态为背景;选题上,注意到既是重要的理论课题,又有明显的理论进展;写作方法上,以相关文献为基础,着重阐述作者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三、几本书覆盖的历史时期是1979~1998年。以后每隔3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将继续编撰类似的专著,以期形成一个连续性的系列,使之成为一种有重要学术参考和保存价值的文献性、学术“档案性”的著述。

四、这几本书的作者,大多是活跃在相关学术领域,有一定知

名度，且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方面有一定学术造诣和理论研究成果的专家，从而有利于体现学术的权威性和理论的前沿性。

最后，由于这4本《理论前沿》的时间跨度大，学术文献资料浩繁，而组稿和编撰的时间又较为紧迫，再加上我们自身的水平有限，在组织和编撰上缺乏经验，因此呈现给读者的书肯定会有诸多不足和缺陷，我们将在以后的工作中加以弥补和改进，力争一本比一本编得更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

1999年4月

第一章 中国商贸理论发展轨迹

改革 20 年是中国商贸理论最为活跃的时期，多种商贸理论研讨会大量举办，各种理论专著（教材）、文章大量涌现，中国商贸理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一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

第一节 80 年代初期的商贸理论

一、对“无流通论”的批判

1. 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及现实社会主义的矛盾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后的未来社会形态的设想是没有商品和货币的社会，整个社会产品的分配采取按需分配进行。列宁创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时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社会主义建立以后，从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到无商品社会之间如何过渡，是否需要过渡期；二是当时实行余粮征集制、定额实物分配制和工业品集中管理、统一支用的政策，遭到农民的普遍抵制和操作上的困难，农业生产急剧下降，扰乱了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经济秩序，直到酿成 1921 年春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为此列宁已认识到，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交换是当时农民惟一能接受的、在工农、城乡之间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强调商业是党和国家“必须合力抓住的环节”，但认为市场交换是暂时的、过渡的形式。当时苏共党内普遍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过渡是短暂的。

这时期对商品、货币、商品交换、商业和市场的认识有3个特点，即“变通、政策利用、即将消失”。斯大林批判了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消亡论，允许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的存在，但把国营企业生产的生产资料排除在商品范畴以外。斯大林在195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以公有制两种形式并存作为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的惟一原因，从而把国营企业生产的生产资料排除在商品范畴以外，提出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只具有商品的“外壳”）的理论，这对中国商业有很大的影响。

2. 长期以来，中国存在“无流通论”

新中国建立初，中国沿袭了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1978年前，中国研究的重点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及从苏联引进了《贸易经济学》，继承了斯大林对社会主义阶段的商品和流通的认识。所谓“无流通论”即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存在商品流通，有4个方面的内涵：

否认商品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否认社会主义条件下流通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否认流通是一个独立的经济过程，把流通与分配相混淆，以分配代替流通；

混淆社会分工和企业内部的技术分工，从而混淆了生产和流通的不同职能。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不同交换主体之间发生的交易行为是独立于生产过程之外的经济活动，属于独立的流通过程，这种交换与企业内部因技术分工形成的属于生产自身的交换是不同

性质的范畴，“无流通论”否认流通过程的独立存在；

否认商品价值规律的根本内容，价值规律的根本要求包括商品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要实行等价交换；

以分配代替流通，从而忽视了商品流通的发展，严重妨碍了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3. 中共“八大”前后，中国对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问题的认识与讨论

1956年“八大”前后，中央察觉到“无流通论”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陈云提出了重视市场调节作用的重要意见，毛泽东提出价值法则“是个伟大的学校”，刘少奇强调对流通和价值规律的研究和讨论。薛暮桥、孙冶方是最早最彻底地对“无流通论”进行批判的。中国经济界曾两次掀起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客观必要性的讨论高潮，第一次是在1956~1957年，讨论的重点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客观必然性，答案是肯定的，占统治地位的是斯大林的观点，认为两种公有制并存是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已脱胎出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第二次是1959年春，在人民公社化、“一平二调”、“共产风”等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做法在实践碰壁后，理论界再次提出如何充分认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并集中了许多正确的见解。毛泽东针对“一平二调”的错误，作出了“价值规律是个伟大的学校”

的论断，号召全党学习和讨论价值规律。但学习和讨论没有深入下去。

4 . 对私改造完成后，“无流通论”在中国的发展及其负面影响

中国对私改造完成后，在“左”的思潮影响下，“无流通论”得到了发展，不仅赞同而且还发展了斯大林“无流通论”的观点，在“文革十年”中“无流通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1970年9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虚拟批判“流通决定论”的文章。后来，毛泽东又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和旧社会差不多，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在“无流通论”的影响下，在实践上具体反映为“重生产、轻流通”，以生产为中心来解决经济生活中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问题，把商业当成生产部门的仓库，生产与需求相脱节，于是生产和再生产产出短缺，使商业的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高，中介的作用不大。

5 . 孙冶方对“无流通论”批判

孙冶方最早开始对“无流通论”的批判。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提出：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论述的一系列原理，去掉“资本”的属性，都适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他60年代在人民大学讲授《社会主义经济论》时，在讲完直接生产过程篇后，专门讲了流通过程篇，这在经济学教学中是具有首创性的。1979年9月，他动完肝肿瘤切除手术，伤口尚未愈合，为了重写社会主义

流通概论，又一次从头学习了《资本论》第2卷，并且对照着俄文版和德文版学习，从那以后，他用了很大的精力撰写《社会主义流通概论》大纲，其中对流通过程篇各章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对立面是自然经济论，而他在批判自然经济论的时候是以批判无流通论为突破口的。孙冶方认为，生产的服务对象是消费者，不是仓库，生产单位要有流通观点；社会主义流通既包括商品流通，又包括产品流通，在流通过程中既要尊重商品价值规律的作用，又要尊重产品价值规律的作用；他在60年代提出，社会主义企业经济核算不能只限于核算劳动消耗的效果，而且要核算资金占用的效果，并提出资金有偿使用的原则，他对固定资金的管理制度提出了成套的主张，已被党和政府所接受。孙冶方对“无流通论”的批判对80年代的改革有很大的影响。

二、生产资料也是商品

斯大林在195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以公有制两种形式并存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和市场交换的惟一原因，从而把国营企业生产的生产资料排除在商品范畴之外，提出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只具有商品的“外壳”的理论，这对中国商品流通的看法和实践产生很大的影响。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只允许部分消费品采取商品的形式存在，而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到改革开放初期，由国家统一管理的生产资料的种类达256种，由各中央主管部门所管理的生产资料有316种。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理论工作者首先对生产资料的非商品性提出了挑战。“在社会主义还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条件下,不仅生产资料在社会主义两种公有制企业之间的交换,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的交换,以及全民所有制企业同个体劳动者之间的交换体现了所有权的转移,因而属于商品交换,而且在全民所有制内部进行交换,由于各企业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它们之间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来相互对待,也属于商品交换。所谓生产资料流通就是以货币为媒介的生产资料商品交换,它是社会再生产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以后国家对生产资料计划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逐步减少了生产资料的指令性计划。

三、关于个体经济和长途贩运的争论

1.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城镇工商业个体经济开始出现并有了发展,出现了个体商店、个体商贩等

对此,经济理论界有两种意见,一部分人认为在现阶段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只能建立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其中包括劳动者的个体经济同时并存的经济制度。个体经济的作用表现为:第一,在生产和流通领域起拾遗补缺的作用,它有利于活跃城乡市场,满足人民生活;第二,大批“文革”下乡的知识青年相继返城,而国家安排又有一定的困难,可以广开门路,增加就业,减少社会压力。也有人不赞成发展个体经济。这种观点认为:一是鼓励个体经济会造成剥削,形成两极分化;二是会扩散“惟

利是图”资本主义思想，使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社会主义教育付之东流；三是会影响和干扰国营和集体工商业经营，总之发展个体经济的思想是一利而百弊。邓小平指出：“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相反地，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存在与发展也好，归根结蒂，是要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和公有制经济，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

2. 关于长途贩运问题

有人认为长途贩运是投机倒把，但有人认为：个人长途贩运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第一，农副土特产品生产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地区之间是不平衡的，产品必然要由产地流向销地。而有些农副产品国营商业不经营或很少经营，需要贩运者运到消费者手中；第二，农民个人的产品，不能全部由本人进城销售，也需要有人集中起来贩运；第三，存在地区差价，城市购买力强，价格高，销量大的情况下必然吸引一部分人从事贩运活动；第四，贩运活动本小利微，集零为整，自行车驮运进城个人付出了运输劳动，只要是政策允许上市的产品，就应允许长途贩运，不应视为投机倒把。人们普遍认识到，中国开放农副产品市场是必然的，就其客观性来说：第一，不同所有制的生产形式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流通形式；第二，城市人口集中，购买力强，对农副产品需求量大而且品种多样，特别是鲜活商品，需要农副产品市场加以调剂；第三，从中国现阶段商品

流通的规模和水平来看，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商业的能量不足以覆盖全部交易，农贸市场是不可缺少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城市农副产品市场得到了恢复和放开。薛暮桥也提出应当为长途贩运平反，要利用市场活跃流通等等。

四、从单一渠道到“三多一少”

1. 单一渠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在单一公有制的影响下，改革初期，“群众对商业网点不足，吃饭、住店、买东西拥挤，提出了许多批评和意见”。1957年，中国县以上的城镇共有商业网点约100万个，每1000城镇居民只有10个商业网点。现有城镇人口增加了近1倍，商业网点反而减到只剩19万个，每1000城镇居民中才有一个商业网点，只相当于1957年时的1/10。许多城市，不但商业网点数目大幅度减少，而且连营业面积也是减少的，许多居民区的商业网点的建筑面积占居民小区宿舍的建筑面积的12%，有的地方几里长的一条街见不到几个店铺，有的一大片居民区没有一个商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万典武指出：城市零售商业网要合理，一是要有利生产，方便生活；二是结构和布局要合理；三是要使企业有合理的盈利；四是按照城市规模和特点，分级设置商业群；零售商业网的设置和管理要实行法治。

2. “三多一少”的提出

1981年，针对中国商品流通渠道过于单一的特点，万典武

提出“多条流通渠道势在必行”的观点：“50年代，我们有过实行多条流通渠道的成功经验，那时既有国营商业，又有公私合营商业、合作店组和个体商业；既有专业的商业部门，又有如盐业、水产那样产销结合在一起的做法；农村里既有农民自己办的供销合作社，又有集市贸易和一定数量的个体商贩。这种多种所有制并存、多条流通渠道畅通的商业体制，适应当时的工农业生产水平和人民生活需要，因而达到了货畅其流、繁荣市场、改善生活、发展经济的目的。”后来，“由于左倾思想的干扰，所有制一味追求‘升级’‘过渡’，形成了实际上的国营商业独家经营，商品流通渠道堵塞的局面，对于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积数十年之经验，渠道单一、独家经营的弊端甚多，非改为多条流通渠道不可。”“为了改革中国商品流通体制上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等缺点，应该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减少流通环节（后来简称为“三多一少”）的商业体制”。关于当时为什么要实行多渠道商品流通的问题，万典武指出：第一，中国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生产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规模、发达程度参差不齐，必然实行多渠道商品流通才能与这种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第二，中国工业、农业、商业都是国营、集体、个体等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它们彼此之间和同一经济形式内部各个单位之间存在着十分频繁的、错综复杂的交换关系，单纯采取国营商业独家经营的单一流通渠道，是远远不能适应的。第三，成千上